

当代中国语言生活中的问题

李宇明

语言学研究的问題可分为甲乙两类：甲类是学科本身提出的问題。如汉语语音学中r的音值、轻声的性质等问題；汉语语法学中主语的界定、双宾句的范围等问題；历史比较语言学中汉藏语系的谱系分类及同源词问題；历史方言学中北京话的形成等问題。乙类是在现实语言生活中发生的问題。如当今世界性的语言濒危问題；多民族国家的语言关系问題；移民环境中子女的语言选择问題和盲文手语的信息化问題等。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乙类问題是语言学的源起问題。如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研究目的主要是解释经典文献。古印度语言学是为学习梵文服务的，而梵文是古印度精神生活和宗教生活的载体。古希腊语言学是在解决哲学的“名实之争”等问題和注释荷马史诗等古代文献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世界古代三大语言学都源自研究语言生活中的问題。

甲类问題产生于语言学形成之后，但总体来看，语言生活中的问題仍是推动语言学发展的主要力量。历史比较语言学是为了构建语言间的谱系关系，进而探究民族间的亲缘关系，从一个方面揭示历史上的人类活动状况。美国描写语言学是在调查、保护印第安人的语言中产生的。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无不是为了解决语言生活中的问題而发展起来的当代语言学科。语言生活问題的研究，是语言学新学科、新理论、新方法产生的温床。

可以说，甲类问題的研究也是学科发展不可缺少的。有些甲类问題，只服务于学科的发展，只有语言学对它感兴趣；但也有许多甲类问題，不仅语言学对其有兴趣，这些问題的研究也对语言生活、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比如北京话的形成问題等。但更应当看到，研究语言生活中的问題，不仅是语言学的源起，也是语言学发展的不竭源泉。本文所列为当前我国语言生活中的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題。

一、虚拟语言生活与语言学研究

用计算机处理语言文字，产生了现代语言技术；现代语言技术给现实语言生活以巨大的促进。虚拟空间诞生后，虚拟语言生活也相应出现。互联网十几年来快速发展，虚拟语言生活也随之丰富和重要起来，甚至许多方面竟然在引领现实语言生活的发展。当今社会，“智慧地球”的概念已经提出，物联网和云计算已经从概念发展为现实，移动网络的发展势头更是强劲，这些都预示着互联网正在发生划时代的革命性变化。在此形势下，虚拟语言生活对现实语言生活的影响必将更加深刻。从

语言生活管理的角度看，虚拟语言生活有以下问题需要及时关注。

第一，中国虚拟语言生活的网络空间，应当尽可能地适合国人的生活习惯，最大限度地适合中华语言文字的使用习惯。这关系到硬件、软件和各种语言信息技术，需要拥有更多的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产权。

第二，不断提升国人的虚拟语言生活质量。从发展的眼光看，虚拟语言生活不是少数人或某一部分人的语言生活，而应当是大多数人的语言生活，具有普惠性。应当帮助更多的人步入虚拟语言生活，减少“信息边缘化”的人群。应当放开思路设想在虚拟空间中可以过哪些语言生活，并有计划地孕育发展它。应当着重建立虚拟语言生活的合理秩序，着力提高虚拟语言生活质量；并把这种秩序尽力向外扩展，为国际虚拟语言生活做贡献。

第三，虚拟语言生活与现实语言生活相互促进。当前，现实与虚拟两个空间的语言生活格局已经形成，这两个空间的语言生活应当相互沟通、相互辅助、相互促进。

虚拟语言生活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首先，新的媒体从来都是语言发展的温床，报纸的出现、广播电视的出现，对语言和语言生活的发展都曾经产生了并仍在产生着巨大影响。而今，网络语言从词语到交际都有很多新特点，如网民的语言行为、语言态度、网络词语孳生传播的特点、网络文体的新样式、虚拟语言生活与现实语言生活的关系等等。其次，信息化技术及其构建的网络空间，为语言研究、语言教学提供了强大的新手段，并能将语言、语言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催生新的语言职业和语言产业，形成最具低碳属性的语言经济。再者，已有的语言学理论是在研究“人际交际”的语言现象中发展起来的，而虚拟语言生活则是混合交际，除了传统的人际交际之外，还有“人机交际”和“机际交际”。对这种混合交际的语言现象的研究，一定能够带来语言学理论的新发展。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问题

众所周知，农民的语言生活与市民的语言生活有很大不同，这就需要对新市民和进城务工人员进行专门的语言培训和指导。而且，在城市建设规划中需要有语言规划，包括城市主要使用的语言、对新老市民语言新生活的指导、对特殊群体（不懂普通话的人群、盲、聋、智障等身心语言障碍者）提供语言服务，以及本地文化特色在城市建设中的传承等。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动，西部的语言问题将漫延到东部，农村的语言问题将涌入城市，这需要有解决新的语言问题的对策。

不容忽视的是，伴随着城乡地图的快速变化，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语言地图”也必将大幅度改写。这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但也会造成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萎缩甚或消亡。语言的基本职能是交际，但语言又不仅仅是交际工具，

它还是资源，记录着文化，渗透着情感；一些语言或方言的萎缩与消亡，意味着中华语言文化资源的流逝，意味着一些人的情感焦虑。当然，语言发展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中国“语言地图”的改写，人们会有各种态度，会给以各种评价。但无论如何，我们首先应当用多媒体技术把现代语言实态记录下来，保存下来，留下今日“语言地图”的轮廓，留下语言的有声数据。其次应当重视在城市语言规划中留出本地语言文化的空间，重视语言文化博物馆的建设，重视语言文化知识的普及。最后，还应认真思考语言政策层面的一些问题，提倡“双言双语生活”，探讨通过双言双语教育和在一些地方建立“活态语言保护区”等措施，尽量加强和延续一些语言和方言的活力。

总之，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认真思考它会对我国的语言面貌产生何种影响；会有哪些语言问题需要解决；会有哪些特殊人群需要特殊的语言帮助；怎样通过科学的语言规划和有效的语言行动，来保证城市化进程的顺畅前行。

三、语言生活的主体性与多样性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国家，各种语言、文字关系的处理，常常涉及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证信息畅通，促进国家认同，这是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在。但同时也应看到，对汉语各方言和中华各语言，决不可忽视、漠视或轻视。普通话和方言的和谐，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和谐，是国家语言生活的理想状态；语言的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和相互使用，是语言和谐、民族和谐的基础。同时还要看到，我国有 30 来种跨境语言，如藏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蒙古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朝鲜语、景颇语、京语等。深入了解这些语言，科学运用这些语言，是和边睦邻的关键，也是为国境铺设的一条新的安全线。

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也使用汉语，包括普通话（国语）和方言，使用的汉字是繁体字；海外华人社区也在使用汉语汉字（华语文）。他们的语言生活状况如何？怎样进行中国四地的语言文字协调？怎样进行海内外的华语协调？这自然也是当今中国语言生活的重要问题。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外语的学习和运用成为国人重要的语言生活，处理好外语学习与母语学习的关系，科学看待外语对中国语言发生的正负影响，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问题，甚至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同时，到中国旅游、学习、工作甚至定居的外国公民越来越多，中国境内的外语服务问题，逐渐提到了政府的工作日程上。但是，对外语服务的方式、内容、领域、语种、人才等等，我们还缺乏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

妥善处理上面提及的各种语言（包括文字）关系，及时化解语言矛盾，构建和

谐语言生活，是当前中国语言规划的大课题。当前语言规划的基本思路，是实现语言生活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语言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但也要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以及外国语言在语言生活中的作用，使得各种语言及其变体各安其位，各展其长，各得其所，相辅相成。

四、信息时代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语言规划的重要任务，是解决语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但是，语言不仅是“问题”，还是资源。语言是许多学科的研究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更应重视的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语言及其知识已经成为信息工业的重要资源，由“软实力”进入“硬实力”范畴。

语言资源可分三类：第一类是自然语言资源，它是在历史长河中自然形成的大众使用的语言，包括共同语及其方言，有些发达的语言还有文字。我国的自然语言资源丰富，但是语言资源调查不充分，保护不自觉，开发利用不科学。值得强调的是，外国语言文字也应看作我国的语言资源。外语是外国人的语言，但绝非与我无关、于我无用之物。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外语应成为当代国人的必备素养。掌握一门外语，就多一条文化沟通的渠道，增加一种观察世界、表达世界的方式。对己而言，外语已成为人生的重要资本；于国而言，外语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利器；就整个人类而言，多一些掌握外语的人，利于国与国间的相互了解与理解，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和谐。

第二类是衍生语言资源，它是对自然语言进行研究和加工处理而形成的，包括语言知识，以及语言知识以各种形式在各个方面的应用。语言知识表现在各种语言研究论著里，语言知识的应用则是多方面的，如：各种辞书、各种检字法、利用语言文字进行的信息检索法、语言文字教科书、语言文字的各种规范标准、语料库、语言知识库、计算机字库、各种键盘输入法、处理语言文字（包括语言翻译）的各种软件技术等。自然语言资源的特点是“不可再生性”，失而不能复得；但是衍生语言资源却具有“再生性”，其再生能力的强弱，与语言学研究水平和科技进步呈正相关。

第三类是语言能力。语言能力主要是自然语言能力，也应包括使用语言信息产品的能力。有了一定的语言能力，母语才能延续和发展，民族之间才能相互理解与团结，外语才能引进和使用，各种衍生的语言资源才能掌控和继续创造。因此，国民的语言能力应看作国家重要的语言资源，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制定国民语言能力标准，即义务教育阶段的语言能力教学标准。

语言资源意识的建立带有明显的时代性。语言资源古已存在，古往今来一直被人类开发利用，但是只有到了信息时代，语言资源意识才可能建立并充分显示其价

值。语言资源意识具有浓重的人文色彩,甚至可以说,它带着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思想而产生尊重文化、善待人类自己的意识。语言资源意识是“绿色”的,是科学发展思想指导下的语言规划理念。

促进语言资源意识的建立,保护好、开发好国家的语言资源,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必须在法律、政策上有明确体现,在行政上要明确责任。在基于语言资源理念的学术发展中,在面向语言资源开发的技术创造中,要有语言产业和语言职业意识,要根据社会需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传统语言产业和语言职业的现代化,并努力发展新的语言产业和语言职业,如语言速录师、语言工程师、自动翻译师、语言治疗师等,将语言资源高速度、高效率地转化为社会的语言经济,收取语言“红利”。

五、国家语言能力及其国际影响力

“国家语言能力”指的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也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其外延起码涉及语种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公民语言能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和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

若不从国家语言能力的角度考察,不少人一定会认为我国是一个语言大国,其实我国的语言能力还比较低。美国是移民国家,据其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可知,美国拥有语种数量达到380种,据信其具有处理500种语言(或方言)的能力,能够为公民开设200来门语言课程。作为对“9·11”事件的深刻反省,2006年美国提出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语言”战略。将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俄语、印地语、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定为与美国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语言。美国期望,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事件,他们都能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持。

我国是外语学习大国,但是就语种能力来看却是个外语资源开发利用的小国,国家能掌握的外语种类有多少,据估计不会超过100种,不到美国语种能力的1/5,不及世界语言总数的1/50。能够开设的外语课程不超过50种,经常可用的外语只有十余种。语种人才分布不合理。在大约三亿外语学习者中,绝大多数都是英语学习者,可以说除英语外,所有语种人才都不足。我国与亚洲、非洲的关系十分密切,牵涉到国家的睦邻战略、资源战略和反恐战略,但是亚非语言一直是我国外语人才培养的“短板”。而且,我国教授的外语一般都是标准语,但是处理国际事务,只有标准语是不够的,往往还需要懂得外语的各种变体。如在与印度维和部队的合作中,需要听懂带有印度口音的英语;我国海军在亚丁湾护航,需要听懂索马里海盗讲的阿拉伯语方言。

普通话是国家通用的语言,但其国际影响力还是十分有限的。汉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会员国使用,“有其名无其实”。汉语在联合国之

外的国际组织里甚至“既无名也无实”。许多国际会议，基本上不把汉语作为会议语言。在国际贸易、教育、科技等领域，汉语也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中国学者在国外发表论文也要翻译成外文。由于历史原因，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华人比较集中，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但即使在这些国家，汉语也处于弱势，其强势语言是英语和马来语（印尼语）。

语言的国际影响力，首先表现在多边外交、重要的国际会议、国际经贸科教交流中。其次表现在外语学习中，即有多少人把它作为外语来学习。近些年，“汉语热”的话题常现报端，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在世界上建了几百所，汉语国际教育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看好中国，学习汉语。但是就实际数据来看，世界上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数，远赶不上将英语、德语、法语等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数。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除了汉语之外，国际上也有不少人愿意学习藏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但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国际教育问题，并没有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教育主导权也没有掌握在国人手中。语言教学要通过课文来实现，课文里面有文化、有观念，少数民族语言的国际教育，是国人的责任，同时也关系到中国语言的国际影响力，关系到国际上能否正确、全面地认识中国。

其实，国家处理国内事务的语言能力也并不充足。现在政府公务人员、大众服务领域从业人员，基本上都是用国家通用语言处理国内事务。但是农村地区方言流行，粤方言、闽南方言、客家方言等还是中国港、澳、台地区的重要交际工具，不懂方言，国家的很多事务没法处理。而我国目前已经有至少8%—10%的孩子一出生就只会讲普通话，不会讲方言，他们逐渐失去了方言能力，“双言人才”存在危机。在民族聚居地区，不懂少数民族语言也不能很好处理民族事务。现在已经有不少少数民族子弟不会说母语，汉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主动性更是不足，民汉双语人才存在危机。

我国的语言能力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不能满足中国发展的新需求。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已为当论之事，当务之急。

六、国家意义的语言权利

语言权利是语言规划的重要问题，也是人们经常遇到、需要解决、然而研究十分有限的领域。语言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语言权利因而也可以分为群体语言权利和公众语言权利。囿于篇幅，本文不系统讨论语言权利问题，只谈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

改革开放使中国由“本土型”发展为“国际型”，国际型的中国必须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告诉给世界，以获取良性的国际生态；把中国对国际

问题的看法告诉给世界，以对国际事务负起应有的责任，发挥应有的作用。话语权可以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发言权，即有资格发言，有机会发言。二是影响力，即发言时有人愿意听，听了之后有所响应。这两个层次又可以称为基本话语权。三是话题权，即有设置话题的权力，有控制话题发展的能力。我国在历史上曾经是拥有很大的国际话语权的国家，虽然那时的国际化程度远不如现在。在今天，在某些领域，我国也逐步拥有了一些话语权，但是总体上看我国还处于争取基本话语权的阶段。获取话语权，首先应当有话语权的意识，其次应当熟悉国际话语规则，最后应有有效举措。最重要的举措是要制定长远的规划，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新闻、语言等各个领域，培养熟悉国际话语规则、能够获取话语权的优秀人才。

国家发展中遇到的语言问题难以在此尽列全举。本文的目的只是表达这样一种见解：关注语言生活问题，研究语言生活问题，是中国语言学责无旁贷的使命，同时也是促进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动因。这种发展不仅会为语言学创建良性的学术生态环境，而且相信会在研究中产生新的理论、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方法。

〔责任编辑：宋 晖 责任编辑：柯锦华〕

汉语史研究中的类型学和信息化

唐 贤 清

汉语史研究历来强调扎实的材料和细致的描写，这个传统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汉语史研究不限于此，还应该以揭示语言规律为己任。这就是说，汉语史研究还要解释语言现象背后的成因，探寻语言的一般规律。这需要理论的指导与创新。目前，在理论指导这一问题上，比较明显的偏差有三类：第一，研究成果多为材料堆积，缺乏理论的概括与升华。第二，不重视语言事实的挖掘，对语言材料的理解不够深入，甚至一味地以西方语言学理论驾驭汉语事实。第三，虽然有材料，也有理论，但是材料与理论缺少有机联系，生搬硬套。对此，学界有过讨论，不一一论列。在这种学术语境下，我们认为当下汉语史研究应该更关注历时类型学研究和汉语史研究的信息化问题。由于历时类型学牵涉的面很广，难以驾驭，也难以深入，而目前学界汉译佛典语言研究又很流行，进行历时类型学研究的空间也很大，因此，我们以汉译佛典语言的类型学研究为例，作为“麻雀”剖析。